

新中国服务经济研究 70 年： 演进、借鉴与创新发展的*

夏杰长

内容提要:新中国成立 70 年以来,服务经济研究走过了一个不平凡的历程。从最初的基本边缘化到如今的空前繁荣,学术界付出了巨大努力。服务经济研究的不断推进和深化,既受益于理论界的思想解放,也得益于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和伟大的改革开放实践。服务业门类繁多,性质迥异,服务经济理论研究和服 务经济学科体系建设难度很大。本文在梳理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服务经济(第三产业经济)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提炼总结了八个研究主题,并对其研究内容、演进历程和学术贡献逐一阐释。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吸收现代西方服务经济理论的有益成果,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经济学,是我国经济学界的新课题、新任务和新使命。

关键词:新中国 70 年 服务经济研究 演进历程 引进借鉴 创新发展

作者简介:夏杰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100028。

中图分类号:F0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02(2019)10-0017-17

一、引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数代中国经济学者扎根于中国土壤,立足于全球视野,借鉴和吸收国外服务经济理论的有益成分,对中国服务业发展、改革和开放进行了多维度、广视角、深层次的研究,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构筑了新中国服务经济学术史上的壮丽篇章,为拓展中国经济学科体系和传承经济学术思想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从文献的时间维度进行梳理,新中国服务经济的研究历程,总体可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研究的主要议题或热点不尽相同,当然,也有些议题贯穿于新中国 70 年服务经济研究的始终。第一阶段为 1949—1978 年,服务经济研究零星点点。在这个阶段,由于服务经济(第三产业)的发展基本不被认可,甚至处于被批评的境地,这个领域的研究几乎是空白,即便有,也是零星点点,基本处于边缘化,是碎片化的研究。第二阶段为 1978—1992 年,服务经济研究逐渐起步。这个阶段,服务业逐渐被“正名”,学术界开始关注服务经济问题。但总体来看,这个阶段在服务经济领域的研究力量比较单薄,研究领域比较狭窄,研究方法也比较单一,基本是定性分析,缺少严谨的实证研究。

*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服务业发展和开放研究”(2018CJY01-B003)。

第三阶段为 1992—2012 年,服务经济研究热度迅速高涨。在这个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正式确立,服务业发展、改革开放都迈上了新的台阶;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并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议题;研究范式从以规范分析为主转向以实证分析为主,并较多地引进吸收西方经济学的有关研究方法,研究视野大大拓展,高水平理论研究成果不断推出。第四阶段为 2012 年以来。在这个阶段,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也是劳动就业以及利用外资的主力军。实践的发展催生了理论的升华。服务经济理论无论研究范围、深度还是研究范式,都较过去有了长足进步,与国际服务经济理论前沿日趋接轨。更为重要的是,这个阶段的服务经济研究视野更加开阔、研究对象更加确定、研究框架更加完善,服务经济学科建设日趋成熟。加强服务经济研究,创新研究范式,拓宽研究内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经济学,是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和历史担当。

二、研究主题和演进历程

新中国成立 70 年以来,服务经济的研究从基本空白到空前繁荣,主题不断切换,无法逐一列举,只能选其最重要、最有影响的几个主题进行阐释和分析。

(一)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争论

中国学者研究服务经济,是从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认知开始的。厘清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问题,才能为加快服务业发展和服务业市场取向改革扫清理论障碍,才能为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服务业统计核算体系奠定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争论就是服务经济研究的缘起,在新中国服务经济学说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通过对这个领域的文献梳理,我们发现,我国理论界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系统研究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80 年代达到高峰,之后基本上很少触及。

1. 1978 年之前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理论争论

新中国成立后对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问题的讨论起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草英、攸全(1962)合作发表了《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一文,是这一争论的起点。在更早的一些文献中,虽然没有明确以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研究为题,但也零星涉及了生产劳动的范围等方面的问题。岳巍(1956)通过对“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系统研究,认为“物质生产领域包括工农业、建筑业、货运以及为生产服务的邮电业、商业和饮食业等部门,而商贸流通、行政机关、军队、公安、文教科卫以及为居民生活服务部门的劳动,均不属于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这一观点成为后来生产劳动争论中“窄派”的重要理论基础。刘日新(1957)探讨了交通运输中的客运是否属于物质生产部门的问题,认为客运具有使用价值,属于物质生产领域,其劳动是生产劳动。杨坚白(1960)从经济平衡发展的视角,对社会各个部门之间的比例问题进行了讨论,主张要在国民经济各部门间按比例地分配社会劳动(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总体来看,在 1978 年之前,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争论尚没有进入主流经济学研究的视野,研究也比较零碎。

2. 1978 年之后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理论争论

1978 年之后,国家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开始鼓励个体劳动发展,西方 SNA 核算体系的研究逐渐被重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划分问题的理论争论也开始激烈起来。这个阶段,学界对这一理论问题的争论,总体可以概括为宽派、中派和窄派。

“宽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于光远、李江帆、肖灼基、杨百揆等。于光远(1981)对生产劳动理论

进行了系统论述。他认为,劳动的物质规定性和区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毫无关系,生产劳动包括物质生产部门与非物质生产部门,非物质生产部门只要为社会所需要都属于生产劳动。李江帆(1981)认为,服务消费品具有使用价值,而生产服务消费品的产业就是第三产业,生产服务消费品的劳动应该作为生产劳动。肖灼基(1980)率先提出,教育部门的劳动也应该属于生产劳动。杨百揆(1980)则提出,商业部门,包括服务业、饮食业部门职工的劳动,都属于物质产品生产劳动。他认为,商业、饮食业、服务业成为独立的经济部门是社会生产发展必然造成的生产分工所要求的,也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这些观点的产生,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背景,即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号召引起了知识界共鸣。但科教文卫体等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是否属于生产劳动,却有很大的争议。在当时,主流观点是这些部门不生产具体的物质产品,因而不属于生产劳动。这些学者冲破传统观念,提出与众不同的看法,实属难能可贵。他们的意见对建立包括服务领域在内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以及在国家“五年计划”中明确提出服务业(第三产业)发展目标,发挥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作用。

“中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何炼成和杨坚白。何炼成(1981)提出要从生产目的出发来划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即凡是能直接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劳动,就是生产劳动。因此,提供特殊使用价值的服务部门和文教卫生部门等一些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属于生产劳动,但纯粹商业部门、财政金融部门、各级党政部门、国防部门等部门的劳动是非生产劳动。杨坚白(1960)认为,应该按照生产关系而不是只按照劳动的物质内容来区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比如,一部分的客运、生活用品修理和营业性服务,属于服务性生产部门,但也是生产部门;科研、教育、公益性医疗、政府等部门则不属于生产部门。依据杨坚白等(1981)的“中派”观点,国际经济统计核算既不能照搬西方的国民经济体系,也不能完全同意MPS体系只考虑物质生产过程而忽略劳务活动的观点,要建立符合中国社会主义生产实践的经济核算体系。

“窄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孙冶方和王积业。他们的核心观点是:只有生产物质资料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其他劳动虽然也有益,但属于非生产劳动。孙冶方(1981)对这一观点进行了系统性论述,他认为,非物质资料生产部门的比重及重要性将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上升,并不能改变只有物质资料生产部门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的理论基础,而且这一理论还与MPS(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具有一致性。因此,为了确保这一体系相关指标的“纯洁性”,在生产劳动体系里,不能掺入非物质的因素。王积业(1981)则从生产劳动一般和生产劳动特殊的视角认为,“马克思讲资本主义意义上的生产劳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是就物质生产劳动者的劳动来说的,不包括非生产领域劳动者的劳动”。“窄派”从生产结果出发,基于生产结果的物质性,对生产劳动进行定义。此类观点也是苏联的正统观点,正是基于这一理论,苏联还建立了与之相匹配的国民经济管理与核算体系,即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窄派”的观点和计划经济时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相契合,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服务业的兴起,以及生产服务在社会生产力提升方面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窄派”的观点与社会现实逐渐脱节,其理论的解释力也越来越弱。

(二)服务产品理论

中国学者对服务经济理论的研究,在20世纪60—80年代,主要从服务劳动性质的角度研究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若干理论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则从服务产业的角度研究服务业或第三产业;在20世纪80—90年代,以李江帆为代表,其他学者也积极参与,从服务产品角度研究,试图建立服务经济学(第三产业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或者学科框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新发展是有贡献的。

在服务业逐渐崛起的形势下,劳动价值论面临适用范围日趋缩小的挑战。对此,李江帆(1984)就非实物产品、非实物使用价值和服务价值理论问题进行了独特的研究,他根据马克思关于实物使用价值与非实物使用价值的论述,分析了两者的异同,得出这样的结论:“以服务形式存在的消费品”虽具有自己的特点,但同实物消费品一样,也具有能够作为价值承担者的使用价值,因而也是具有价值的产品。随着社会化大生产与分工的发展,服务消费品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意义日益提高。随后,李江帆在1990年出版的《第三产业经济学》中系统地探讨了长期被我国经济学界忽视的第三产业领域的经济理论问题。他从社会产品概念的更新入手,论证了无形的服务也是一种产品,然后依照马克思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四环节”运动为主线,深刻剖析服务产品理论,对服务产品引起的经济现象、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等做了系统阐释,提出了一系列富有新意的论点,突破了许多传统观点的束缚。张卓元(1991)对这部著作及其理论突破方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部著作以服务产品的运动为研究主线,构筑起一个逻辑严密的第三产业经济学理论新体系,弥补了我国第三产业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空白。”

白仲尧(1990)也是较早研究服务产品理论的学者。他认为,任何一门经济学都有自己的出发点和主体范畴,服务经济学的研究应以服务劳动为起点,以服务产品为主题范畴,要围绕服务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来展开研究。他认为,服务产品是产品的一个分支系统,与农业产品和工业产品相比,有共性的一面,比如劳动性和效应性,但更多的是异质性和特殊性,比如不可储存和无形性,基本是以运动的形式提供给消费者。白仲尧(1987)还敏锐地预测到,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服务业将会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发达,服务产品在社会总产品中的份额也必然不断提升,服务产品的生产和交换已经成为人类社会重要甚至是主要的经济活动。现在看来,白仲尧在1987年做出的这些预判,非常准确。如今,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54%,服务消费在城乡居民生活中的地位明显上升。

(三)服务业统计和核算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国内学者对该领域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和探索。根据服务业统计和核算领域的国内相关文献,按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线索进行全面系统梳理,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服务业统计和核算研究被忽视阶段(1949—1985年)。受物质生产观的影响,国民经济统计核算中几乎没有统计第三产业(除交通运输业外)。受计划经济条件的影响,理论界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生产理论的片面理解,长期认为大部分第三产业部门是非物质生产部门,只消耗社会财富、不创造价值和使用价值,作为非生产性劳动的第三产业甚至未被当作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部门来考虑,故而一直游离于理论研究的视野之外。

第二阶段,服务业统计和核算研究不断向国际接轨的过渡阶段(1985—1993年),即服务业逐步被纳入国民经济统计核算范围,MPS体系和SNA体系(试行)并行阶段。这一时期,MPS和SNA两套体系处于并行阶段,要完全转向SNA体系,必须解决服务业的非生产性问题,才能名正言顺地对服务业进行统计和核算。因此,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一些专家学者开始对服务业的非生产性这一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争论,前文已有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第三阶段,服务业统计和核算研究的全面探索阶段(1993—2013年)。这一阶段,我国全面进入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新核算体系扩大了生产核算范围,把第三产业完全纳入GDP核算。这一实际做法,对比过去只认定物质生产才是生产的MPS核算观点,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从此,第三产

业的统计正式纳入 GDP 核算,第三产业增加值核算正式进入统计实践,一些专家学者开始对第三产业的具体生产和使用的核算方法与问题进行研究。田小青(1993)介绍了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三种核算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方法。岳希明和张曙光(2002)认为,我国现价服务业增加值被严重地低估,服务业增长率计算也可能存在偏差。

第四阶段,服务业统计和核算研究的新阶段(2013年以来)。在这个阶段,服务业与传统产业的新融合、线上与线下的深度融合、移动支付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日臻成熟等,催生带动了如平台经济、智能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这些问题,之前的统计工作从未遇到过,服务业统计和核算面临许多新挑战,统计理论方法亟待新突破。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逐渐增多,试图寻找解决办法。许宪春(2008)对我国新经济的核算发展和问题进行了精辟的阐述,试图构建新经济指标体系和统计核算框架。这个阶段,技术进步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日益深刻。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逐渐成为服务业发展的主导力量。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如何统计,学术界也有初步的探讨。魏和清(2007)在界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统计范畴的基础上,根据我国最新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02)目录,提出了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核算分类体系及核算指标,对知识经济形态下如何改进与完善国民经济核算方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四)服务业增长

根据新中国服务业发展历程特征,服务业增长研究可分为三个重要阶段:初步探索期、不断拓展期和全面突破期。

初步探索期(1949—1992年)。从新中国成立至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这一时期内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处于不断改革与探索中,对服务业的认知逐渐成熟。总体来看,在这个阶段,服务业问题基本边缘化,学界对服务业增长这样的重要议题也很少问津。这个阶段,服务业的主体是商业,因此,研究服务业发展或服务业增长问题主要聚焦于商业。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工商业的发展定位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学界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因而主张“所有的商业工作中,采购部门、批发部门和零售单位,都应努力服务生产、促进生产”。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允许和鼓励个体经济发展,服务业是最适合个体经济发展的经济形态。在这种背景下,长期被压抑的服务业活力被释放出来。学术界研究服务业发展、服务业增长的论文和著作开始不断涌现,服务业理论和实践的研讨会也不时举行。这段时间,比较有影响的研讨会会有两次:第一次是1985年5月在江苏常州举办的全国服务经济理论研讨会,由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和江苏省商业经济学会联合举办,会议聚焦服务业与现代经济发展的关系、服务劳动和服务产品、服务业增长、服务业就业等热点议题展开热烈讨论(高涤陈,1985)。第二次是1985年8月在辽宁兴城举办的全国第三产业经济理论讨论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和辽宁省商业经济学会共同主办,这次研讨会对第三产业基本理论、第三产业统计核算、第三产业增长和第三产业发展对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李江帆,1986)。与会专家的主要论文汇集成册为《第三产业经济理论探讨》,由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出版,是研究中国服务经济思想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这两次服务经济(第三产业)研讨会,冲破了发展服务业的理论障碍,对服务业许多争论不休的问题基本达成了共识,有力地推动了服务业的发展和增长。

不断拓展期(1992—2012年)。这段时间,党的文件正式确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市场取向改革向纵深推进,服务业发展活力逐渐被释放出来。理论上讲,服务业较高速增长值得期待。但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增长幅度很小。1991—2002年,服务业所占比重由33%增长到时34%仅增加1个百分点。这一水平明显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对于中

国服务业发展比较缓慢、比重偏低的这一现象,江小涓和李辉(2004)的研究发现,统计口径、补偿性增长与常规性增长差异、城镇化水平、人口密度、服务业参与全球化程度较低、观念体制和政策障碍等影响了服务业比重提升。这个阶段,中国服务业增长速度并不是很快,服务业占比依然很低,但并不影响有些学者对服务业发展前景和潜力持乐观预判。夏杰长(2010)依据影响中国服务业增长的多重因素,通过计量分析,预测到2020年左右,中国有可能迎来“服务经济时代”。这一时期,国内学者研究经济增长的两篇重要文献是江小涓发表在《经济研究》2011年第4期的论文和黄少军的著作《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江小涓(2011)从服务业的复杂性和研究难点出发,研究了服务业增长的真实含义、影响因素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她认为,服务业增长要从真实增长和名义增长两个维度刻画,真实增长主要体现在新增服务消费,名义增长体现在相对价格上升、服务专业化和外移、自我服务转化为市场化服务三个方面。黄少军(2000)从理论和实证论述了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特别是对“服务业增长之谜”的阐释有许多亮点,遗憾的是,该著作主要是阐释西方著名学者富克斯、钱纳里、林达尔、鲍莫尔、辛格的论述,并没有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服务业增长和服务业结构优化等重要问题进行实证研究。

全面突破期(2012年以来)。这一时期,服务经济地位迅速提升,服务业稳居半壁江山,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接近60%,中国服务经济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服务业增长依然是学术界热点话题,但研究的视角更加开阔,研究也更有深度。比如,不是就服务业增长自身,更多的是把服务业增长与经济增长、经济转型等重大主题结合研究,探索服务业增长背后引发的变化。比如,对中国经济服务化、服务业增长是否放缓了经济增长速度,就很有争议。第一种观点认为,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服务业比重的提升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趋势,但这一趋势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服务业成本病”和服务业的低效率,进而导致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减速”。宋建和郑江淮(2017)使用中国省级数据,实证检验工业生产率相对上升导致服务业价格相对提高和就业份额提升,进而引发经济增速放缓。第二种观点认为,服务经济并没有起到放缓经济的作用。张月友等(2017)认为,经济服务化是“服务经济时代”的一个重要刻画,主要体现在服务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服务经济容纳就业人口情况等,他们按照1990年不变价格衡量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发现截至2015年,中国服务业的实际增加值比重始终小于第二产业,因而当前决定中国处于“结构性减速”阶段的经济服务化条件尚不具备。

经济增长一般伴随着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但事实上,情况并不总是这样。比如,2004—2014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服务业也是加速增长,但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仅由35%增长到37.1%,只增长了2.1个百分点。显然,这一时期我国服务业的增长主要是传统服务业部门,特别是房地产和商贸服务业,因此产生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服务业结构升级滞后的“悖论”。余泳泽和潘妍(2019)基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约束视角对此做了解释,认为增长目标主要通过影响要素资源在服务业内部的配置,显著抑制了服务业结构升级。

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是我国服务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经过多年的中高速增长,规模和占比已不是我国服务业最亟须解决的问题,高质量发展才是我国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战略定位。这几年,学术界关于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文献明显增加,主要集中在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意义、约束条件、潜力和实现路径等。陆江源等(2018)在计算基于消耗系数的投入产出关联强度和基于产业链接强度的技术效率乘数的基础上指出,中国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扭曲严重,资本和劳动要素错配制约了中国经济效率的提升;中国服务业需要创新体制机制以消除要素配置的扭

曲,推动结构优化和高质量发展。刘奕和夏杰长(2018)认为高质量发展阶段,服务业发展的潜力在于产业融合、服务创新和传统服务业转型升级三个方面;为实现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应鼓励竞争、扩大开放,统筹服务创新资源,推动多利益相关方协同共治的同时,运用灵活多样的政策手段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姜长云(2019)研究了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要求,探讨了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政策体系,提出形成一批顺应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要求的企业和企业家,营造有利于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营商环境,培育契合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要求的产业生态,创新完善包容审慎的服务业监管框架和政策体系。

(五)服务业生产率

服务业生产率的研究,长期以来都是服务经济学界的主流议题。新中国成立至今,对服务业生产率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孕育与萌芽期、争论与探索期、迅速爆发期、深度拓展期。

1. 孕育与萌芽期(1949—1978年)

从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改革开放,国内学术界关于服务业生产率的研究依然存在一个事实上的真空地带,不过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准绳,围绕服务生产究竟是不是属于生产劳动、服务产品的物质性问题和核算等领域的讨论,为改革开放后服务业生产率研究的起步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做出了有益的铺垫。

2. 争论与探索期(1978—2000年)

服务业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国内学者对服务经济问题的极大关注,关注领域也越来越广泛,而不仅仅局限于抽象的理论争论,对服务业生产率(效率)这样的具体问题的研究也逐渐多起来。在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之一是服务产品的价值问题。李江帆(1984)坚定地认为,马克思讲了物品有价值,但从来没说过只有物品才有价值。不承认服务劳动和物质劳动一样表现为价值,就根本不能解释服务消费品生产上耗费的并实现为社会劳动的抽象劳动的实质。围绕劳动价值论对服务业展开的讨论,开辟了服务业生产率研究的新天地。陶桓祥(1982)认为,服务业在社会再生产总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愈来愈重要,必须尽快建立服务经济学,解决好怎样以最小的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等问题。实际上,这也是如何提升服务业生产率的问题。关于提升服务业生产率的积极作用,骆耕漠(1989)进行了解释:“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生产水平的提高,许多非生产劳动关系的个人生活服务转化为社会化和专业化的各种生活服务业,并继续增加新项目和扩大规模”。

3. 迅速爆发期(2001—2012年)

这个阶段,服务业生产率的研究文献大量涌现,而且随着数学分析软件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应用和普及,学术界较多地使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服务业生产率进行研究,徐宏毅等(2005)就利用Frontier 4.1计算程序对中国1992—2002年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TFP)进行了测度,发现在过去的10年中,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42.5%,并且这一贡献主要来自技术进步。顾乃华和李江帆(2006)借助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使用面板数据,分析了我国服务业技术效率的区域差异及其对劳均服务业增加值区域不均衡的影响,发现中国东、中、西部服务业技术效率存在显著差异,加剧了服务业区域发展失衡现象,而关键在于各地的市场化进程不一致。李勇坚和夏杰长(2011)研究发现,从投资/产出增量比来看,服务业作为一个整体是三大产业部门中最高的,这一事实说明,从整体上看,服务业的确是一个高资本消耗的部门,而且投资效率较低,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主要是服务业投资仍然以国有投资为主。

4. 深度拓展期(2012 年以来)

这一时期,服务业改革开放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创新发展和开放发展是服务业的重要战略选择,中国服务业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广度和深度越发显著。作为对这一现象的回应,刘丹鹭(2013)从国际化、创新和企业生产率三者之间的关系出发,对中国服务企业创新收益的差异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中国出口企业的创新性较弱,而进口企业的创新性较强。在服务业中,只有当企业的国际化战略和创新战略相匹配时,企业才能最大程度地获取两者带来的收益。2015 年,服务业增加值占比首次超过 50%,中国迎来了名副其实的服务经济时代,对服务业生产率的研究也更加深入,不少学者开始利用新的方法和数据对服务业生产率进行再测算。王恕立和王许亮(2017)运用 SBM 方向性距离函数和全域 Malmquist-Luenberger 指数估算出中国 2002—2014 年各地区服务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TFP)变动及其分解项,发现中国服务业绿色 TFP 整体呈现增长态势,但表现出较大的省际和区域异质性。夏杰长等(2019)采用半参数的 OP 法,对中国 2007—2016 年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发现在细分服务行业中,房地产和金融业等 17 个行业的技术进步程度,要高于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以及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行业。

(六)服务业劳动就业

劳动就业历来是经济社会发展中最主要的变量之一,就业数量和质量不仅是宏观经济运行的指示器,也反映社会民生。因此,对服务业就业问题的研究始终贯穿于服务业研究学术思想史。新中国成立以来,服务业劳动就业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 服务业劳动的社会地位和性质的理论争论(1949—1978 年)

服务性质的劳动,服务产品的生产过程与消费者的被服务(消费)过程是一致的,生产服务的劳动因此凝结为有型的物质产品。由此便引发了学术界对服务性劳动者的社会地位以及服务性劳动是不是生产劳动的探讨与争论。这个阶段的服务业以商业为主体,大多争论也以商业劳动为例。北京日报社理论部(1963)组织了一系列关于商业服务工作性质的大讨论,主要议题涉及商业服务工作是不是低人一等,青年人应该如何对待商业劳动,等等。编辑部收到的稿件中,观点迥异,有人认为商业服务工作是受气和伺候人的工作,也有人认为商业服务工作与其他工作具有同等的地位。这次讨论,对于提高参加商业劳动的知识青年的觉悟、巩固商业和服务业队伍、推进商业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2. 侧重于研究服务业就业功能的新认知(1978—1992 年)

1978 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开始陆续返城,陡然增加了城市的就业压力。理论上讲,服务业是解决劳动就业的最主要渠道。但在当时,服务业就业的性质还在争论,对服务业就业的功能还认识不足。这是亟待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个阶段,学术界主要聚焦于服务就业功能的研究也就不足为奇了。戴云蒸和肖清益(1981)基于太原市北城区过去片面强调以钢为纲、轻视商业和饮食服务业而导致生产与生活比例严重失调的教训,总结了大抓商业和饮食服务业的恢复和发展经验,并提出扩大商业和饮食服务业就业的策略。在国家人口流动政策出现第一轮松动的背景下,张军和李陵生(1985)基于部分大中城市的调查分析发现,20 世纪 80 代初期在城市部门已经出现了大规模的暂住人口,如何解决流动人口的就业是理论工作者必须回答的问题。学术界普遍认为,应当将第三产业,即服务业作为解决城乡富余劳动力就业的重要途径。刘品安(1991)认为,劳动力转移都是从农业转向非农业,特别是第三产业。无论欧美发达国家,还是我国的经济经验,莫不如此。他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四次劳动力转移过程和特点,认为随着就业压力的加大和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一定会成为劳动力转移的主渠道。

3. 多视角、全方位推进服务业就业研究(1992 年以来)

这个阶段,服务业呈加速发展趋势,服务业就业的作用更加凸显,学术界对服务业就业问题的研究迈入了新阶段,视野更加开阔,视角更加多样,剖析问题更加深刻,对策研究更有针对性。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办公厅和《管理世界》杂志社在 1992 年 3 月举办了一次“中国第三产业发展与发展政策研讨会”,较为全面地探讨了我国第三产业发展严重不足的根源和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是“小而全”“大而全”的自我服务体系抑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因此,要从打破企业办社会服务和条块分割等方面着手,加快第三产业发展,扩大第三产业就业渠道和就业能力。李冠霖和任旺兵(2003)从宏观、微观和产业三个层面分析了制约我国第三产业扩大就业吸纳能力的制度障碍:在宏观层面,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劳动力流动政策、行业垄断等限制了就业的扩大;在微观层面上,企业用人制度僵化也极大地限制了服务业的就业空间;在产业层面,我国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长期以来社会化和专业化程度不足,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的现象对生产服务业的发展极为不利。扩大服务业就业,当然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目标,但也要注重服务业的就业效率,要尽可能避免制造业劳动力向服务业转移过程中的生产效率下降的问题。蔡昉(2017)对这个现象和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做了实证测算,结果表明,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整体上高于第一产业,却低于第二产业。因此,劳动力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未必带来生产率的总体改进。因此,加快发展服务业以及提高服务业占比时,要遵循生产率提高原则,把重点放在生产率高且增长迅速的现代服务业上。

(七)服务业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

传统上,服务业被视为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对服务业技术进步和基于技术进步的服务创新研究比较少。进入 21 世纪后,服务业技术进步及服务创新问题才得到关注。不过,该领域早期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传统的知识密集型服务领域。例如,电子商务、环境服务、软件服务等典型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魏江、Mark Boden,2004)。近几年,随着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服务业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这一研究主题越来越受到重视,研究范围、研究内容和研究深度不断拓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聚焦功能与作用。在经济增长方面,任兴洲(2015)开始聚焦技术的创新应用对服务业创新升级的重要作用,未来“互联网+”的重点应是运用互联网改造传统产业,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现代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创新,发展壮大新兴模式和产业,有利于促进经济新增长点的发展,增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在促进就业方面,吴清军(2019)注意到服务业数字化改造在产生就业机会、萌生新职业、提高就业质量、提升就业能力等方面正在产生深远影响。此外,在提升效率和服务质量方面,夏杰长(2019)认为服务业的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发展与运用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与作用。

二是深化应用研究。任兴洲和王微(2017)认为新一轮科技革命促进了服务业分工的持续深化,在服务业态、商业模式、运作方式和管理方式上的更迭将成为常态。夏杰长和肖宇(2019)总结了当前服务创新的主要模式及服务创新与服务业转型升级之间的理论关系,强调服务创新的数字化、平台化、融合化、标准化和品质化等方面的内容。朱峰和来有为(2019)总结了美团点评在服务业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数字化改造经验,认为至少可在 IT、经营、营销、人力资源开发等多方面帮助生活服务商家发展,以有效匹配市场需求,提升服务品质。

三是分类细化研究。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崔向林和罗芳(2017)注重服务业的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对制造业的影响与协调发展问题,特别要关注制造服务化、服务制造化与互联网

的高度融合发展。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表现为数字化改造对生活性服务供给的改善与品质提升,在此方面,阿里研究院、美团研究院等企业研究机构的有关研究报告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公共服务业领域,表现为新技术应用对公共服务供给的改善与平台经济等方面的内容。江小涓(2018)认为,网络技术与大数据的发展对政府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项基本职能有积极的影响,同时也带来若干问题和挑战,需要与时俱进,做好应对措施。此外,还出现了许多对具体产业的应用类研究,例如养老、餐饮外卖、旅游酒店、智慧出行等,各产业、行业各具发展特点,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尽管服务业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的相关研究可以有很多角度,但总起来讲,都要紧跟实践应用领域的步伐,以问题导向为前提,落实到问题与对策分析上,以实现促进产业良性发展的最终目标。

(八)服务全球化

自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经济学界主要研究政治经济学和计划经济学等,为计划经济提供理论基础,服务全球化问题几乎没有涉及。1978年,我国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学术界对服务全球化问题的研究开始起步,但总体比较薄弱。自加入WTO后,服务贸易壁垒逐渐被打破,服务业国际资本流动日益活跃,服务业开放成为对外开放的重头戏,学术界对服务全球化的研究步入高潮,成为服务经济学研究的最主要议题之一。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李西林(1985)是较早将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与对外开放联系起来的国内学者,他主张把经济对外开放与服务业高速发展紧密联系起来,通过推动服务业对外开放来促进服务业快速发展。经济全球化、服务全球化是大势所趋,但究竟是什么因素推动了服务全球化,服务全球化与制造业全球化相比又有什么显著特征呢?张祥(2012)认为,信息技术快速推进了服务全球化和服务离岸化,中国服务业的发展和开放应该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积极开拓服务全球化带来的市场潜力。江小涓(2008)认为,全球制造转向全球服务是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制造全球化与服务业紧密关联,服务全球化具有不同于制造全球化的四个关键特征,即非物质资本的重要性、企业将非核心服务剥离出来、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占主体、服务业对外开放产生的影响显著不同于制造业。

近几年,国内学者较多地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研究服务全球化,特别是服务贸易问题。姚战琪(2019)通过建立中介效应模型系统考察了中国生产性服务的中间品进口贸易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参与度和后向参与度的影响,发现生产性服务中间品进口通过制造业服务化的促进作用,促进了我国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度的不断提升。中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比较弱,尤其是生产性服务贸易,这是客观事实。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分工,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所处的价值链环节和分工地位必定提升。为此,周蕾(2013)提出了要把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一种知识与人力资本密集的中间投入全球产业链中,使之成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纽带,支撑服务贸易竞争力提升。长期以来,服务贸易的地位被忽略。如果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分析,采用增加值贸易计算方法,结果可能很不一样。夏杰长和倪红福(2017)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根据增加值贸易数据库(TiVA)测算,服务业大致占到全球出口贸易的50%。不同统计方法衡量出口中服务业出口占比存在较大差异,主要原因是传统总值贸易统计存在“重复统计”,低估了服务业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

当前,全球化正面临严峻的挑战,过去几年里,针对全球化的质疑不绝于耳,甚至有不少“逆全球化”的呼声和举措。针对这些问题和挑战,荆林波和袁平红(2017)结合全球化发展历程,利用世

界银行数据,对全球化进行分析发现,全球化并没有逆转,但全球化正面临全球收入差距扩大、贫困问题依然突出、网络安全监管缺位、全球金融体系社会基础薄弱等严峻挑战。当全球化走在十字路口的时候,作为仅次于美国经济总量的大国,中国将在全球化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要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三、引进借鉴和创新发展的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对服务经济理论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持基本否定甚至批判态度;第二阶段是逐渐接受,零星翻译了几部代表性的服务经济学著作,把西方服务经济理论和研究方法介绍到国内,国内学者在论文写作中也较多借鉴、使用这些理论和方法;第三阶段是比较系统地引进借鉴西方服务经济理论,较大规模地翻译西方服务经济著作,推出“服务经济译丛”,西方服务经济理论在中国学术界广泛传播、吸收和创新运用。

(一)对西方服务经济理论的基本否定和批判(1949—1985年)

改革开放之前,甚至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学者对西方服务经济理论基本上持否定或者批判态度。傅殷才(1981)发表在《世界经济》的一篇论文,对西方服务经济理论进行了全面评判。他认为,“服务经济”理论是现代资产阶级的思潮,是资产阶级理论家借科技进步带来的服务业部门扩展和经济“繁荣”,并以此否定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一个概念。在他看来,现代资产阶级“服务经济”理论,是一种虚构资本主义假象,借机维护资本主义垄断统治和麻痹工人阶级的庸俗政治经济学。他认为,费希尔、丹尼尔·贝尔、罗斯托等西方学者对人类社会阶段划分是违背科学依据的,资产阶级“服务经济”理论过度夸大了服务部门的作用,否定了物质生产部门劳动者的巨大贡献。尽管他对资产阶级“服务经济”理论持否定和批判态度,但也不完全否定其参考价值,有些社会主义国家非生产领域的发展速度也快于生产领域,那么,应该寻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服务经济的某些共同之处和一般性趋势,比如科技进步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服务业发展对解决就业的作用等。

(二)对国外服务经济理论的零星引进(1986—2010年)

这一阶段,陆续翻译了国外一些经典的服务经济学著作。最早引入国内的是苏联著名专家M·B·沙洛特科夫的著作《非生产领域经济学》(蒋家骏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非生产领域经济学是苏联和一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20世纪50年代形成的一门新的经济学科。M·B·沙洛特科夫在这部著作中明确其研究对象是非生产领域(教育、卫生、科学与科学服务、文化与艺术、客运、住宅公用事业与居民生活服务业等部门)的经济关系及其发展规律。M·B·沙洛特科夫从社会分工的性质以及参与创造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的角度,把国民经济部门分为物质生产领域和非生产领域,对非生产领域工作者劳动的性质进行了专门讨论。笔者查阅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院主办的《国外社会科学》杂志,1956—1982年,有多篇介绍或阐释它的论文。可见,中国学者在当时是认可“非生产领域经济学”这个概念的,“非生产领域经济学”和“第三产业经济学”基本通用,而且其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范式也大体相同。

这段时期,翻译并引进到国内的西方现代服务经济著作主要有以下四部。

(1)维克托·R·富克斯的《服务经济学》。富克斯的这部著作,是服务经济学科的里程碑式的经典之作,具有极高的学术地位。他是第一位明确将服务经济作为研究对象的学者,其主要贡献

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提出了进入“服务经济”国家的判断标准,他是这样表述的:“美国现在正在经济发展方面开创一个新时期,即第一个一半以上就业人口不从事食物、衣着、房屋、汽车或其他实物生产的国家。”显然,富克斯是用服务业就业占全部从业人员比重来判断一个国家(地区)是否步入“服务经济时代”。二是与美国著名学者鲍莫尔一起提出了“鲍莫尔-富克斯假说”,即服务业生产率偏低的问题。不过,富克斯对服务业生产率偏低的问题有新的认识。根据刘涛 2019 年 1 月对富克斯的采访,富克斯表示不太同意服务业“成本病”的观点,因为可以依靠技术进步提升服务业生产率。

(2) 格鲁伯、沃克的《服务业的增长:原因与影响》。本书以加拿大为例,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服务业的重要性进行了分析与论证。作者对加拿大的研究结果也适用于其他一些工业化国家,对服务业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也有许多借鉴和启示。比如,通过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增加生产服务要素的投入来改善厂商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从而提高制造业生产率。

(3) 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来临》。本书提出的后工业社会理论,是西方最有影响和代表性的现代社会发展预测理论之一,当前许多关于新技术革命的重要思想、观点都与之有渊源。该书被誉为“一部能够在未来许多年中影响人们思维的著作”。这本书并不是专门研究服务经济的,与服务经济有关的内容主要聚焦在第二章“从商品到服务:正在变化的经济形态”。但是,由于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经济形态就是服务经济,由此引起的经济结构、就业结构、社会治理和阶层结构都要受到服务经济形态的深刻影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加速发展阶段,随着现代化进程推进,将来也会过渡到后工业社会。丹尼尔·贝尔的这些思想,对现在和未来,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4) 欧文·詹森的《服务经济学》。这是一部非常有特色的服务经济学著作,作者以服务这一无形产品的特殊性为分析起点,把主流微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运用到服务经济学,做出了许多独到的研究成果,有如下两个方面的突出贡献:一是研究发现,城市化进程导致经济活动在空间进行重叠,推动了服务业发展,或者说,城市化就是服务业发展的动力,从而抵消了鲍莫尔成本病所说的服务和产品之间不断扩大的生产率差距,这意味着服务业份额的快速上涨,仍能够保持经济较高速增长;二是研究发现,以不变价格衡量的真实总消费中,服务消费的份额并没有提升,而是基本维持在 50% 左右。

这四部著作的出版,传播非常广泛,影响非常之大,从事服务经济理论研究的国内学者基本把这些著作当作研究之工具书,广为引用和借鉴,极大地推进了服务经济理论研究。

(三) 对西方服务经济理论的系统引进和借鉴(2011 年至今)

跨入 21 世纪,服务业发展和开放迈出新步伐,服务业地位快速上升,服务经济学的研究也从过去的备受冷落到日渐重视。但总体来看,服务经济理论研究既满足不了服务业发展实践的需要,也落后于其他经济学科。这段时间,研究服务经济的积极性很高,越来越多的学术机构和学者步入这个领域从事理论和政策研究。但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是,服务经济理论研究滞后,研究方法和手段陈旧,对现代服务经济理论系统掌握较少。在这种背景下,把西方现代服务经济理论系统引进,并借鉴运用,迫在眉睫。因此,江小涓和薛澜于 2009 年动议翻译一套服务经济学丛书,历经三年多,在各位翻译者的努力下,首批译著共有十四本陆续由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西方发达国家服务业发展较早,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甚至绝对主导地位,这些国家(地区)服务业的发展有经验也有教训,在此背景下诞生的服务经济理论对我们的学术研究和实践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翻译一批西方发达国家相对成熟的经典文献是我们开展服务经济理论

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这套“服务经济译丛”涉及面很广,依据其研究对象,大体可以分为三大类:服务经济理论和服务业统计、服务经济主要行业、服务全球化与服务贸易。下面分三个方面,对各本译著的主要内容概要介绍或阐释。

第一类,关于服务经济理论与服务业统计问题的研究。这套“服务经济译丛”,与服务经济基本理论问题相关的有六本著作。《服务业经济思想史:三个世纪的争论》(让-克洛德·德劳内、让·盖雷著,江小涓译)是服务经济学说史的代表作之一。作者以历史的眼光,精心梳理了服务经济思想发展历程,对近百位学者的观点依次介绍和剖析,对各流派理论观点进行严谨对比和评判,对马克思的服务业思想也单独列举并翔实分析,特别是对后工业社会和新工业主义时代服务业思想和服务业发展的探讨,颇具时代特征,对我们发展新兴服务业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服务部门产出的测算》(兹维·格瑞里奇斯主编,程大中译),是一个服务业核算方面的会议论文集,虽是论文集,但逻辑结构依然很严谨,基本囊括了服务业核算中的基础问题和主要议题。比如,服务业数据来源及其修正,服务业主要行业(证券、银行、运输、分销、教育、托幼等)生产率的测算。服务业与制造业日益融合互动,是大势所趋,这本论文集从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服务业的微观基础、服务业的国际比较以及公共部门四个角度讨论服务部门的统计测算及其影响问题。对企业绩效的离散性和异质性的研究,也是这本论文集的一个亮点。中国学者这些年对该领域的问题也非常关注。《服务业:生产率与增长》(埃内斯托·费利等主编,李蕊译)是一本论文集,研究的主题聚焦于服务业增长和生产率有关的问题。数据建模和案例分析相结合是本书的一大亮点。本书在翔实的数据和模型分析基础上,结合意大利奥特莱斯零售卖场的发展历程和七个 OECD 国家分销体系的结构变化的具体案例,分析了技术较低部门的服务业变化速度和持续通货膨胀压力之间的关系等。本书得出的重要结论是,服务业的作用主要集中于它在 GDP 和就业中所占比例的大幅度上升,集中于它的生产率增长的低速度以及相对价格的上升,其相对价格经常要高于价格增长的平均速度。《服务业的增长:成本激增与持久需求之间的悖论》(腾·拉加、罗纳德·谢科特主编,李勇坚译)是一本论文集,对服务业增长和服务业生产率做了系统、经典的研究。服务业的增长一直是一个困扰经济学家的问题,这种困扰来源于几个方面,首先是服务业的定义问题,服务业是用剩余方法定义的,这种方法使利用标准的经济学方法对服务业进行分析非常困难。例如,如何定义服务业的生产函数就是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其次是服务业的生产率问题,这是本书研究的主题,作者从各方面对服务业的生产率进行了探讨,例如,使用全要素生产率代替劳动生产率,以最终产品生产率(FPP)代替单一部门生产率等,这些努力体现于本书的各个章节之中。最后是服务业的真实份额问题。真实份额来源于两个方面,即服务业的供给与需求。从供给看,服务业一直饱受“成本病”之苦;从需求看,对服务的需求似乎永无止境。本书的作者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最全面、最前沿的探讨。《生产率:信息技术与美国经济复苏》(戴尔·乔根森等著,荆林波等译),该书以 1995 年以来美国复苏超出预期为例,探寻美国经济超预期复苏和增长的源泉,发现信息技术对经济发展有异乎寻常的贡献,特别是信息技术价格的加速下降,促成了信息技术在所有领域的广泛运用,进而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作者也辩证地指出,不能把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仅局限于这些信息技术。本书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总结性地提出了经济研究的新议程——互联网时代经济学,奠定了互联网经济学的研究基石。《服务业的生产率、创新与知识:新经济与社会经济方法》(让·盖雷、法伊兹·加卢主编,李辉等译)也是一本论文集,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鲍莫尔为此书作序并撰写了其中一章。本书以“服务业与整体经济增长关系的悖论”展开相关研究,这个悖论缘自困扰了中外学术界 40 多年的一种经

济现象: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不但没有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长,而总是伴随经济增长减速,学术界也称之为“结构性减速”。2013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服务业增速比较高,服务业占比快速提升,但GDP增长速度逐年下降,正好步入这个“悖论区间”。因此,这本书探讨的经济现象,对我们很有现实针对性和启发性。此外,本书的第二部分(第7—11章)重点研究了服务创新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等问题,探讨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在创新系统中的独特作用,以及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增长是如何改变服务业生产率的。

第二类,关于若干服务行业的研究。服务业门类繁多,性质迥异。这批“服务经济译丛”选择了五本研究特定服务业行业的著作,比如教育、医疗、体育等行业。这些行业在国内需求量巨大,关注度很高,兼具“社会事业”和“经济属性”领域,政府和市场都要发挥作用,但又很难把握政府和市场的作用边界。《教育与培训经济学》(克里斯廷·达斯特曼等主编,杨娟译)是一本论文集,基本概括了教育经济学的最新进展和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包括:教育资源和教育环境对学生成绩的影响;不同教育层级和不同年龄段如何进行政策干预以及干预效果的评估;影响教育的经济和社会回报率的主要因素;职业技能与技术培训的经费来源及其对就业的影响。《要钱还是要命:给美国医疗体制的一剂强药》(大卫·M. 卡特勒著,刘国恩等译),介绍了美国医疗体系(医疗服务、健康管理和全民医保等)的发展历史以及面临的挑战,探讨了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遇到的困境和挫折,特别是从经济学视角,探析保险覆盖、支付方式、融资手段、质量管理、成本控制等具体问题,并提出了发展思路和对策建议。中国与美国医疗保健体系有许多不同之处,但作者探讨的这些问题,对推动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和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也具有借鉴意义。《旅游和休闲业:塑造未来》(克劳斯·韦尔梅尔、克里斯廷·马西斯主编,宋瑞等译)是一本论文集。旅游与休闲是人类故已有之并始终伴随的经济社会现象,它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外在表现,也是其演进的内在动力,更是人类文明进步和全面发展的重要形式,被公认为最具潜力的幸福产业。旅游与休闲的研究,正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从事旅游与休闲的研究,往往需要多学科齐心协力,多方法并举运用,本书综合运用经济学、统计学、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地理学、哲学、信息技术科学来开展旅游与休闲业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包括:人口结构和闲暇时间的变化对旅游休闲业的影响;慢生活与全球化进程的冲突;旅游与休闲新业态;信息和通信技术如何改变旅游休闲业。《体育经济学·第一卷》(布拉德·汉弗莱斯、丹尼斯·霍华德主编,邓亚萍等译)和《体育经济学·第二卷》(布拉德·汉弗莱斯、丹尼斯·霍华德主编,赵长杰译)是两本研究体育经济的论文集。体育是满足人们健康幸福生活的重要方式,学术界对体育经济的研究越来越重视,这两本论文集就是该领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对体育产业组织、团队所有权、体育赛事、职业体育投入产出关系、体育产业的融资和场馆建设、体育俱乐部运营与管理、运动员肖像权益保护等进行了深入探讨。

第三类,关于服务全球化问题的研究。如今,经济全球化遇到了一些挑战,民粹主义有所抬头。但全球化大趋势不可逆,研究服务全球化将是我国服务经济学的重头戏。这套服务经济译丛推出了三本关于服务全球化方面的译著。《国际服务贸易手册》(阿迪特亚·马图等主编,陈宪等译)由四部分组成,主要对服务贸易做了全面介绍:第一部分为服务贸易框架,主要包括综述、《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服务贸易的基本经济学原理;第二部分为服务贸易分析,主要包括服务贸易的度量、国际服务贸易的壁垒和自由化后果的实证分析、服务贸易中的地区主义、金融服务与国际贸易协定;第三部分为部门和模型分析,主要包括基础设施服务贸易、运输服务、电信服务贸易、卫生服务贸易、电子商务监管、提供服务的工人的临时流动;第四部分是附录。《服务业全球

化:理论与实践启示》(耶尔·阿哈罗尼、里位齐·纳查姆主编,康昕昱译)是一本论文集,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描述了服务全球化的缘起和基本概念;第二部分阐述了服务业 FDI 的特征和趋势,特别解释了服务为什么越来越可交易;第三部分阐述了服务业全球化的理论基础,探讨了影响服务业国际化竞争力的主要因素,诸如公司声誉、区位、专业服务能力和知识获取能力等;第四部分是案例分析,分析了航空业(包括航运和维修)、酒店业、快递业等服务行业的国际化发展案例及其启示,研究了究竟哪些因素对这类服行业向国外发展起决定性作用。《21 世纪的外包与离岸外包:一个社会经济学视角》(哈巴哈江·科尔、达利瓦·派·辛格主编,姜荣春译)也是一本论文集,对离岸外包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多视角、全方位的探讨,包括离岸外包有关的全球生产、贸易、投资和技术效应及其风险控制,如何降低外包的风险与不确定性等。案例研究是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比如对德国、印度、西班牙等国家案例做了深度剖析,还专门分析了大型 IT 外包项目“失败”的案例及应该吸取的教训。这些离岸外包的理论与政策,以及具体的案例,对我们发展服务外包,特别是 IT 外包项目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这套译丛的出版,推动了中国服务经济学界的研究工作,几乎是服务经济学界理论工作者和研究生的案头必备书籍,拓宽了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丰富了国内学者的研究方法,促进了我国服务经济理论研究更加接轨国际水准。

对现代西方服务经济学的引进借鉴,并不意味着我们全盘照收,而是为我所用,是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国情,吸收现代西方服务经济理论的研究成果,创立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服务经济学,是我国经济学界的新课题、新任务和新使命。

参考文献:

1. 白仲尧:《服务产品是服务经济学的主体范畴》,《商业经济研究》1990年第4期。
2. 白仲尧:《谈谈服务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财贸经济》1987年第4期。
3. 北京日报社理论部:《关于“商业服务业工作是不是低人一等”讨论的体会》,《新闻业务》1963年第7期。
4. 蔡昉:《中国经济改革效应分析——劳动力重新配置的视角》,《经济研究》2017年第7期。
5. 草英、攸全:《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中国经济问题》1962年第9期。
6. 崔向林、罗芳:《“互联网+”背景下上海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调发展研究》,《上海经济研究》2017年第11期。
7. 戴云蒸、肖清益:《发展第三产业是广开就业门路的重要途径——对太原市北城区的调查》,《经济问题》1981年第9期。
8. [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来临》,高铨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9. 傅德才:《评现代资产阶级服务经济理论》,《世界经济》1981年第12期。
10. 高涤陈:《关于服务经济理论讨论会上提出的几个问题》,《商业经济研究》1985年第4期。
11. [加]格鲁伯、沃克:《服务业的增长:原因与影响》,陈彪如译,上海三联出版社1993年版。
12. 顾乃华、李江帆:《中国服务业技术效率区域差异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2006年第1期。
13. 何立峰:《服务业创新发展研究报告》,中国计划出版社2017年版。
14. 何炼成:《三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学术研究》1981年第2期。
15. 黄少军:《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6. 江小涓:《大数据时代的政府管理与服务:提升能力及应对挑战》,《中国行政管理》2018年第9期。
17. 江小涓:《服务外包:合约形态变革及其理论蕴意——人力资本市场配置与劳务活动企业配置的统一》,《经济研究》2008年第7期。
18. 江小涓:《服务业增长:真实含义、多重影响和发展趋势》,《经济研究》2011年第4期。
19. 江小涓、李辉:《服务业与中国经济:相关性和加快增长的潜力》,《经济研究》2004年第1期。
20. 姜长云:《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界定与推进策略》,《改革》2019年第6期。

21. 荆林波、袁平红:《全球化面临挑战但不会逆转——兼论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角色》,《财贸经济》2017年第10期。
22. 李冠霖、任旺兵:《我国第三产业就业增长难度加大——从我国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的演变轨迹及国际比较看我国第三产业的就业增长》,《财贸经济》2003年第10期。
23. 李江帆:《第三产业经济学》,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24. 李江帆:《略论服务消费品》,《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3期。
25. 李江帆:《略论服务消费品的价值问题》,《上海经济研究》1984年第10期。
26. 李江帆:《全国第三产业经济理论讨论会观点综述》,《南方经济》1986年第1期。
27. 李西林:《开放与第三产业》,《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
28. 李勇坚、夏杰长:《服务业是节约投资的产业吗?——基于总量与ICOR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1年第5期。
29. 刘丹鹭:《服务业国际化条件下的创新与生产率——基于中国生产性服务企业数据的研究》,《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30. 刘莱夫:《商业工作要促进生产的发展》,《前线》1959年第1期。
31. 刘品安:《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理论模式和现实选择》,《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1年第2期。
32. 刘日新:《客运是物质生产部门吗?——划分是生产领域与非生产领域的原则》,《教学与研究》1957年第6期。
33. 刘涛:《服务经济研究的重要开创者和幕后导师》,《中国发展观察》2019年第12期。
34. 刘奕、夏杰长:《推动中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主要任务与政策建议》,《国际贸易》2018年第8期。
35. 陆江源、张平、袁富华、傅春杨:《结构演进、诱致失灵与效率补偿》,《经济研究》2018年第9期。
36. 骆耕漠:《个人服务的社会化和分类统计问题》,《财经问题研究》1989年第2期。
37. [瑞典]欧文·詹森:《服务经济学》,史先诚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8. 任兴洲:《产业互联网的发展与创新》,《中国发展观察》2015年第8期。
39. 任兴洲、王微:《“互联网+流通”究竟到了哪一步》,《中国中小企业》2017年第6期。
40. 沈柏年、卢建、陈永杰、方宇:《中国第三产业增长与发展政策研讨会纪要》,《管理世界》1992年第3期。
41. 宋建、郑江淮:《产业结构、经济增长与服务业成本病——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产业经济研究》2017年第2期。
42. 孙治方:《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的讨论——兼论第三次产业这个资产阶级经济学范畴以及社会经济统计学的性质问题》,《经济研究》1981年第8期。
43. 陶桓祥:《尽快建立服务经济学》,《财贸经济》1982年第4期。
44. 田小青:《GDP及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核算方法》,《中国统计》1993年第7期。
45. 王恕立、王许亮:《服务业FDI提高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吗——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17年第12期。
46. 王积业:《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区分问题》,《经济研究》1981年第9期。
47. [美]维克托·R. 福克斯:《服务经济学》,许微云等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48. 魏和清:《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统计核算问题研究》,《科技进步与对策》2007年第12期。
49. 魏江、Mark Boden:《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创新》,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50. 吴清军:《服务业数字化是稳增就业的重要保证》,《北京日报》2019年7月8日。
51. 夏杰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中国经济行稳致远》,《光明日报》2019年第6期。
52. 夏杰长:《迎接服务经济时代的来临》,《财贸经济》2010年第11期。
53. 夏杰长、倪红福:《服务贸易作用的重新评估: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财贸经济》2017年第10期。
54. 夏杰长、肖宇:《以服务创新推动服务业转型升级》,《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55. 夏杰长、肖宇、李诗林:《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再测算与影响因素分析》,《学术月刊》2019年第2期。
56. 肖灼基:《应该把教育看作生产部门》,《人民日报》1980年2月2日。
57. 徐宏毅、张子刚、欧阳明德:《计量经济学在中国服务业生产率测度中的应用》,《华中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年第4期。
58. 许宪春:《中国国民经济核算:发展·改革·挑战》,《统计研究》2008年第7期。
59. 杨百揆:《商业部门职工的劳动是物质生产劳动》,《经济研究》1980年第4期。
60. 杨坚白:《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平衡和不平衡问题》,《经济研究》1960年第5期。

61. 杨坚白、于光远、钟兆修、杨春旭:《首都经济理论界继续座谈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问题》,《经济学动态》1981年第9期。
62. 姚战琪:《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制造业服务化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影响——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研究》,《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63. 于光远:《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中国经济问题》1981年第1期。
64. 余泳泽、潘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服务业结构升级滞后并存之谜——基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约束视角的解释》,《经济研究》2019年第3期。
65. 岳巍:《国民收入计算方法论》,《经济研究》1956年第3期。
66. 岳希明、张曙光:《我国服务业增加值的核算问题》,《经济研究》2002年第12期。
67. 张军、李陵生:《发挥城市多功能作用与发展第三产业》,《理论学习》1985年第5期。
68. 张祥:《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服务经济战略》,《全球化》2012年第11期。
69. 张月友、董启昌、倪敏:《中国经济进入“结构性减速”阶段了吗》,《经济学家》2017年第5期。
70. 张卓元:《〈第三产业经济学〉序》,《财贸经济》1991年第8期。
71. 周蕾:《生产性服务贸易与全球价值链提升》,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72. 朱峰、来有为:《美团推动服务业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数字化改造——美团助力有戏电影酒店快速发展带来的启示》,美团研究院官方微信,2019年8月30日。

China's Service Economy Study in the Past 70 Years: Evolution, Introduction, Reference and Innovation

XIA Jiechang (National Academy of Economic Strategy, CASS, 100028)

Abstract: In the past 7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study of service economy has gone through an extraordinary course, growing from a basically marginalized subject to a popular and thriving field of research as it has never been before.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made tremendous efforts.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and deepening of the study of service economy benefits not only from the ideological emancipation brought by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but also from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service sector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Given the great variety of services in the service sector,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study the theory of service economy and to construct the discipline system of service economics.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of service economy (tertiary industry economy) in China in the past 70 years, this paper chooses eight research topics, explaining their research contents, evolution and academic contributions one by one. For Chinese economists there lies the new subject, new task and new mission to draw from the beneficial results of modern western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the service economy while adhering to the position, viewpoint and method of Marxism, and innovate and develop socialist service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70 Years of New China, Service Economy Research, Evolution Process, Introduction and Referenc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JEL: L84, O14, O31

责任编辑:汀 兰